

## 第三十五章

---

### 妖 变 棒 棒

满洲大地上，红、蓝两种政治力量在明争暗斗中，红方渐占上风。共产党、八路军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日渐成熟。

他们并不急于入主各大城市，而是兵分两路：一路从北往南，稳扎稳打。先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土改），发动农民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让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做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翻身农民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积极投入解放战争的行列。于是，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补充而日益壮大。同时，苏军也将大批缴获的武器装备转交给了这支队伍，使之如虎添翼，以排山倒海之势一路南下，锐不可当。

另一路则是政治工作队。共产党由陕甘宁边区抽调出大批政治、军事干部，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身份向东北各大城镇进行渗透，伺机而动，直至公开进行政治、军事活动。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南马路伪“农业合作社”大厦的门

上，国民党刚挂出“哈尔滨市警察局”的招牌，水道街的原日本“高岗商号”大门上就出现了共产党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的牌子，老百姓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这哈尔滨市谁家警察说了算。

那“蓝色”警察局我没进去，不知内幕，后来时间一长，我也弄清了“蓝色”警察局的内部构成，原来其中大部分人是伪满的警察和宪兵！而“红色”公安局长我却认识，他叫周维斌，乃旧社会的一个流氓头子；公安局侦缉队队长韩兰春却是个五金行业出身的买卖人。他们不知如何骗得了共产党当局的信任，竟变成“红色”人物了。看来这些人都在重操旧业，只是投靠的政治对象不同而已。

对于将来谁当政掌权，老百姓无权过问，只是盼望着早点过上安定的日子，盼着外国兵（不论是大鼻子还是小鼻子）赶快滚蛋。既然光复了，就应该让咱中国人自己出头来治理国家，用不着外国人在这添乱。当年对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的感激之情，已被违纪苏军的劣迹冲淡而留下了仇怨。人们翘首企盼着真正的中国政府快些来接收政权，整顿治安，让百姓们安居乐业。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四年了，东北的老百姓还一直没有见过咱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啥模样呢！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人们在奔走相告：“国军明天要来接收哈尔滨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顷刻间就传遍了大街小巷。饱受战乱之苦，又忍受着十几年亡国奴屈辱的老百姓，激动得彻夜难眠。天刚蒙蒙亮，街上便热闹起来。临街的商店、民宅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到处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比过年过节还热闹。对国军进城的路线，人们议论纷纷。各种猜测最后

趋于一致：国军的大部队将乘火车从长春到哈尔滨，然后由火车站经霁虹桥直下道里区无疑。于是，从早上七八点钟开始，老百姓和社会各界组织的队伍便占满了道里区最长的大街“新城大街”。又有人说，国军将在水道街的第一中学安营扎寨。人们跑去一看，果然，停课已有半年多的第一中学里张灯结彩，门前国旗、彩旗迎风飘扬，院内、校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飘溢着美酒佳肴的香味……人们急切地盼望着一睹抗战八年，劳苦功高的国军的风采。准备尽其所有来犒劳、慰问天神般的国军将士们。

冰天雪地之中，站麻了双脚，望穿了双眼的人们仍热情不减，真诚地，耐心地等待着。十四年啊！咱们中国的军队，你们终于回来了……

上午十一点左右，人们的呼喊声由远而近：“来了，来了！”西南方向人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我所站立的方位是水道街一家商店的台阶，视野广阔，可以将欢迎的场面看得一清二楚。在沸腾的人群中，前呼后拥地走来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一律穿着崭新的灰色军装。百姓们拥上去，有的抢抬机枪，有的抢背背包，有的抢不到东西干脆伙同几个人就把军人举到了肩头，扛着走。激动的人们不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为好。队伍已无法成列，像一股灰色的细流，几乎被狂潮般的人群所淹没了。

此情此景，使每个人都不能不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这支队伍被人潮举着，推着，蚂蚁搬家一样进三步、退两步渐渐接近了。我激动之余，心里开始琢磨：这一百多人，按编制该是一个不够数的连队编制。如果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抗战之旅，军装为何如此之新？细看脸色，气质，也绝无征尘或硝烟的痕迹。有的人能明显看出是大烟鬼！他们所

携带的武器也不是正规军的美式冲锋枪，而是短骑步枪。而且除了两挺日本造重机枪之外，并无其他军旅用品。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个少校阶级的营长，观其外表一眼认定是东北人，伴他身边的是一个穿着国民党警察服装的中年人。瘦削脸戴眼镜，一眼认定他是南方人。两人全被老百姓举在头顶，在拥抱、欢呼中应接不暇。在锣鼓声、鞭炮声和欢呼声中，第一中学校门大开，煎炒烹炸的声音和香味与鞭炮声和火药味混在一起，将热烈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潮。人们随着国军队伍拥入校门，大铁门关了半小时也没关上。许多人被连推带劝地请出了大门，仍意犹未尽，围在校门外久久不愿散去。后来听说，原定的欢迎大会和各界代表讲话都没进行，全被宴会取代了。大吃大喝之中，抗战英雄们的豪言壮语和各界人士的欢迎词都是在碰杯中进行的，其详细内容老百姓就不知道了。

带着疑问，我在第二天就跑到了出连长家。听他一番介绍，我才弄明白这一“国军入城仪式”的闹剧真相。原来，哈尔滨老百姓迎来的所谓“国军”，竟然是伪满“国都”长春皇宫里“警卫军”铁石部队的化身！这些人是国民党“劫收”大员们为了实现占据哈尔滨，造成国民政府正式接管哈尔滨市的事实而花重金雇来的雇佣兵。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关内的各个战场上正与解放军打得不可开交，疲于奔命，哪里抽得出一兵一卒来哈尔滨举行“入城仪式”？情急之下，出钱雇来的这些伪满残余，脱下伪军服就换上了现赶制的新军装，全是为了蒙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那个前头带队的营长姓萧，乃是“铁石部队”一个连长的妖变；那个穿警察服装的国民党高级警官叫余秀豪，系中统特务，是光复后国民党首任的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真是树木尚未成林而野兽却先

满山了。

“国军人城式”后，则一批批劫收大员也随之到来。第一长官便是国民党市长杨绰庵。他带着一批政府要员，分别住进了市政府大楼和日本人留下的大旅馆“名古屋”里，开始大肆搜刮苏军手指缝中漏下的财物。

面对这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的局面，我心中更觉茫然，不禁有些垂头丧气。老田说：“老弟先别急，愚兄自有门路，保你有事干，有饭吃。在家呆着别动，等我的好消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半个月后，老田果然找到了我家，让我跟他走。我忙换上一身新衣服跟他走出了家门。这地方离我家很近，原为伪满“专卖总署”。大楼门前有岗哨，一个长约丈许的大木牌上写着“哈尔滨市交通警察大队”几个字。岗哨向老田立正敬礼，使我明白老田定是在这个衙门谋到了官职。

他带着我直接来到了总队长室，叩门而入，我紧跟其后。老田向坐在写字台后的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敬礼，介绍说：“总座，这位就是我向您提到过的左同志。”那人身穿没有星花的将官军服，欠了欠身，请我们坐下，很客气地问长问短，谈了起来。此人叫张海涛，东北人，国民党少将退役。这次也是作为“劫收”人员之一，出任武装交通警察总队队长之职。张总谈吐文雅、简练，很快切入正题，立时便任命我为这个机关的书记（秘书）。而老田已任武警处处长之职了。

第二天我正式上班，当天就遇上了五六个原江上军的军官，已先我上任。大家握手言欢，混得一团和气。此处名为武装交通警察，其实只有二十几支旧步枪，由社会上网罗来的一些散兵游勇拿着枪轮流去门口站岗。当时的哈尔滨哪有

什么交通秩序可言，而我们这个总队也根本不管什么交通问题，实际上是一支武装后备队。

大家在班上每天除了看报、喝茶就是吹牛、聊天，哪有什么公事可办。偶尔由张总队长召集大家开开会，听取训话和上级指示，谈谈政治局势给大家打打气。剩下的事就是将街上的道听途说当成情报交上去略尽搪塞。队里宿舍和食堂与猪圈无异，但每天可供三餐混合面馒头、猪肉炖白菜。养着一群废物在这儿给党国撑门面。

一天下午，一辆大轿车由一辆武装摩托车护卫，开进了交警大院，车上走下来市长杨绰庵和警察局长余秀豪。后边跟着四个便衣保镖和一个獐头鼠目、管家模样的“腿子”。原来是余局长陪着市长大人来视察交警大队来了。

杨绰庵是个又白又胖，肥头大耳的南方人。但他北方话讲得挺清楚。他鼓励大家忠于党国，说蒋总裁统一全国的日子即将到来。并拍拍每一个人的肩膀，连声叫好。说：“张总队长，你收罗了一班虎将啊！”把张总队长乐得满脸通红，吭哧半天才挤出一句：“全仗市长栽培。”然后，队长、局长陪市长进内室密谈去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则在外间各就各位，装模作样地办公，直到又列队送走两位政府大员。

这天，我去总队长屋里送一份表格，碰见一个犹太青年带着四个端转盘枪的苏联宪兵怒气冲冲地直闯进来，冲着张总嘴里呜里哇啦地大叫大嚷，吓得张总目瞪口呆，不知何事。我在一旁听懂了一半，似乎是什么“牛皮是我们的东西，你们为什么……”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我哪敢硬充明公。知道一句不合适，这些大兵就能开火。他们杀人是和闹着玩一样的。

张总忙叫我去找二毛子孙警佐来当翻译。

孙警佐进了屋，满不在乎地和那个犹太青年握手，与四个嘴里噙着毛嗑的大鼻子宪兵打招呼，像老朋友一样。

原来，这个犹太人说后院里的几吨牛皮是他由苏军手里买下来的，为什么你们给锁上，霸占了！让把钥匙交出来。张总一听，脸色大变，也吼叫起来，说这是敌产，我们有权扣留、接收。二毛子原话翻给了那个犹太人听。那四个宪兵先火了，吐出嘴里的毛嗑皮，骂骂吵吵地一齐将枪口顶上了张总的脑门子。张总一屁股坐下来，面色由红变白，鼻尖冒出了汗珠，让我把梁军需叫来。正在门外偷听的老梁哆哆嗦嗦地蹭进来。其中两个宪兵立刻调转枪口，顶上了他的脑门。吓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总无法，只得央求将牛皮留下一半，两下平分。那犹太人说啥不干，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起来。最后张总只好叫老梁把仓库钥匙交了出来，将这伙瘟神请走。刚“劫收”的一块肥肉又叫人抢走了，气得张总直蹦高，冲着楼下跺脚，恨恨不已。据我揣测，这伙人一定是二毛子孙警佐勾引来的，没家贼引不来外鬼。弄走牛皮卖了钱，这小子少不得分肥。当然，这想法我烂在肚子里也没露出半句。

事后听老田说，这点损失仅仅是咱大队“劫收”财产的三分之一。这幢楼里的地下室还有满仓的猪鬃、马尾没被发现哩。有了这个教训，梁军需便忙着将地下室入口伪装起来，上面堆上破烂、杂物，每天往外边跑，去找商人接洽，打算早点把货卖出去换成金条或者银元。

警察局长余秀豪又来了。这次他是来调人的，需要一个军人出身，有带兵经验的和一个能写能说，精通日语的人才。而这两个人选，除老田和我莫属。经过一番拉锯般的讨价还价，张总到底拗不过这个中统特务，只好忍痛割爱。此

事对我来说倒无所谓，而张总却委实有些不快，原因是一个得心应手的马屁精没了。

这些劫收大员们大部分住在“名古屋”大旅馆中，各局局长加上市府要员共七八个人食宿在那里。但管理食宿的几个白俄老太婆却非常势利眼，收了高价的食宿费，但服务却十分不周，甚至饭后连茶水都不供应。任你千呼万唤也不买账，除非再拿出小费，她才嘟嘟囔囔地送来一壶白开水。见此情景，我给这几位大员送去了电茶壶、茶叶、砂糖之类的东西，深得张总他们的好感。以至张总的专用马车，一定得等我到来才一同乘车去总队上班。我这一走，张总的种种不便是可想而知的。

转到了市警察局，老田分到了治安处当处长。我被分到外事处对日工作组。这里与交警总队相比可大不一样，人人精明强干，没一个废物。惟有一点相同，就是表面为党国效力，骨子里在拼命捞钱。这些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搜刮财物，挖空心思地损人利己，良心早被狗吃了。在这里我又遇见好几个伪宪兵，他们干起这类事来更是轻车熟路，经验丰富。

我所在的外事处对日工作组，是按国际法规定，正在着手安排遣送日本人回国的具体工作。由于打杀日本人的各类复仇案件屡屡发生，忙得外事处上下一塌糊涂。借处理案件之机占便宜、发横财的人则大有人在。其中一个姓李的家伙，我早就认识他，过去是伪法院的书记官。年纪轻轻就极贪财好色，落在他手里的案犯家属没一个能逃过他的魔掌。他借职权之便，收其财物，奸其妻女，无恶不作。我断定此人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我刚来就接手了一桩“隐匿敌产案”。

木村洋行是道里区地段街口的一月日本人开的小百货商店，店里的东西早在“八·一五”当天就被中国老百姓哄抢一空了。但可能还有一部分贵重货物被事先藏了起来。外事处两条腿的警犬嗅到了点味儿，认为油水不小，于是业主木村老头子就被抓了进来。

但由于几番拷打全无结果，便将老头子关进了后院的暂设牢房。外事处姓鄂的头头命令我接管此案，仔细审讯，非要从荞麦皮里榨出油来不可。这姓鄂的家伙长得肥头大耳，见肉就吃，见酒没命，为人十分油滑。对我在面子上还满过得去。他明知道我也是个伪满残渣余孽却仍不放心，三番五次探听我的来历，打听我的靠山是谁。我为了震住这家伙，在一次新华楼饭店的晚宴上，我故意脱掉上衣，露出腰间的“张口等”，借酒遮脸大吹一通：“兄弟不是白丁，吃这碗饭是有人赏给兄弟的，各位打听打听……”我装疯卖傻胡扯一通，弄得鄂胖子和其他人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又常常以一点小事为由，故意出入余局长的办公室，使不少人背后嘀咕我是余局长的人，得罪不得。更可笑的是那个周督察长，背后竟然说我是“八路”。我也将计就计，不去分辩，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了。

在翻阅日本案犯的卷宗时，我发现大部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值得立案。犯人也不过都是些过去伪警察局中的日籍内勤人员和靠薪水过日子的小职员。不过其中有几个日本浪人却非善类。这些人一个个一脸横肉，目露凶光，贼头鬼脑，过去中国人可没少吃过他们的苦头。在审讯时，我把在江上军中受过日本人的气全在他们身上发泄出来，让警员们一顿皮鞭子蘸凉水，打得这些“指导民族”的武士跪

地求饶。然后再问他们案情，这些家伙才乖乖地有问必答了。

我到后院去看了一下牢房，女牢里关了三个白俄女人，不用问，这是外事处对俄工作组的白俄侦察员弄进来的，不过是想从她们的嘴里套问些敲诈勒索的目标。这些人与我无关。不过男牢里那个叫木村的日本小老头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我一看，忙回到外事处找鄂胖子商量，主张立刻放木村老头回家，否则死在牢里，不是鸡飞蛋打了吗？弄不好，还得搭上一副棺材。

鄂胖子和那个姓李的一合计，觉得有理，同意放人。我便骑上自行车亲自去找木村的老伴，让她来领人。老太婆一听这消息，跪拜在地泪流满面，忙叫了一辆三轮车跟着我来到了外事处。我翻开卷宗查到犯人收监时所存的财物栏里有金表、戒指和五千元红军票，但只见文字不见物了。那姓李的在一边推托再三，毫无拿出来意思，只是说：“叫他滚蛋算了！”我心里明白，这些东西早被他私吞了。于是，我只好让我的助手小田帮忙，打开牢门架出了木村老头，交给老太婆拉走了。临走，那老太婆又跪地冲我磕了两个头，连说：“救命恩人，后报有期。”

第二天，下班后，吃过晚饭天已大黑。我信步走访了木村老头的家。在二楼一间昏暗的小屋里，塌塌密上躺着小老头，额上敷着一条毛巾。老太婆跪在旁边守护。一个四十多岁的下女通报了的到来，那老太婆马上站起来冲我连连鞠躬道谢。我以探病为由，其实，本意是来假惺惺买好的。木村老头一见是我，忙坐了起来，低头行礼，连叫“救命恩人哪，神仙保佑你啊”之类的话，我醉翁之意不在酒，闲扯了一通什么就要遣送日本人回国了的一类鬼话。那老太婆已经

从甲间屋拿出来一个花布包袱和一把花洋伞，跪下放在我身边，连说：“一点小意思，务请收下。我们老两口太感谢了！”老头子也说：“这点东西，对恩人是太微不足道了……”我假惺惺地推托了一阵，嘴里说着不好意思，手已经拿起了东西，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打开包袱一看，里面是一大块厚呢料子，足够做一身中山服或者一件外套大衣。里边还裹着一叠红军票，我一数是三千元。我从中抽出三分之一揣到兜里，决定明天把它分给小田，而那把花洋伞当然要归我老婆了。

这就是我到外事处弄到的第一笔外快。